

■对 话

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专访：

卓今：为数字时代书写自己生命的普通人正名

□本报记者 许 莹



新大众文艺自成一个生机勃勃的世界,各种生命精神在此得以舒展

记 者:卓今老师,您好!首先恭喜您凭借《劳者歌其事——新大众文艺与文学精神的重构》获得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能否请您分享一下该著作的创作缘起?这本理论评论著作相较于其他对于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的研究有哪些创新之处?我们如何理解书名中的“劳者歌其事”?

卓 今:感谢您的祝贺与《文艺报》的关注。这个奖对我个人而言分量很重,评奖委员会以这样一份殊荣肯定了一个正在发生的文学事实,肯定了那些在数字时代的缝隙里书写自己生命的普通人。这个奖,某种程度上是颁给新大众文艺本身的。从2018年中国诗词大会外卖小哥雷海为夺冠开始,我注意到一个现象,人们开始阅读和讨论外卖骑手写的诗、流水线工人写的散文、工地上的人拍的生活短视频。我作为地方社科院的研究者,经常要关注文学现场,要做一些田野调查。我发现,真实的文学现场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们既有的理论框架和批评话语,似乎难以准确地描述和命名正在发生的这一切。

在写作这本书时,我试图为这一现象提供一种整体性的把握。数字技术带来的创作权下沉,正在重新定义“谁是文学的主体”“文学为谁而写”“什么经验值得被书写”等根本性问题。我想做的就是,为这场变迁画出一幅相对完整的图景。在理论框架上,我想建构一些理论。书中提出的一些概念,以及对新大众文艺时间起点的判断、对“准主体”的辨析、对AI写作和赛博空间新文艺的相关分析、对新大众文艺边界的探讨等,有利于促进读者和研究者更准确地理解这个新生态的运作逻辑。尤其是“劳动者星丛”,我借用了阿多诺的“星丛”概念,意思是不把事物强行纳入某个既定的概念框架,而是让事物各自保持其独特性,同时让它们在某个观察视角下彼此照亮、相互说明。用星丛来指称劳动者写作,就是想表达这种既独立又关联的状态。在研究中,我

不想把新大众文艺仅仅当作一个研究对象,我更大的收获是在与它的对话中不断修正自己的理论预设。新大众文艺自成一个生机勃勃的世界,像春天里的原野,万物葳蕤,每一种生命精神在此得以舒展。

书名“劳者歌其事”出自古代典籍,我把它借过来做书名。它在字面上准确对应了“劳动者写作”这个主题。“劳者”一词在当下语境中也有了比古代更丰富的内涵。它不再仅仅指体力劳动者,而是泛指一切在数字时代以自身劳动创造价值,同时也在劳动中感受到真实生存经验的人。工人在工地上挥汗是劳动,程序员、白领在写字楼工作也是劳动,一切以思想和身体参与这个世界的变化的都是劳动。他们都值得被文学照亮,也都应当有发出声音的权利。

记 者:在梳理新大众文艺的形态特征、辨析其文学精神的当代内涵的过程中,您进行了哪些关键的思考与打磨?写作中是否遇到过核心的理论难点或认知困惑,又是如何厘清与突破的?

卓 今:在这个过程中,有这么几个关键的思考点。第一是对文学精神内涵的重新理解。人们习惯于带着所谓“纯文学”的标准去看素人写作,认为他们的语言不够精致,结构不够讲究。然而,这些直接来自生活经验的文字却最能打动人。这种割裂逼着我回到文学发生学的原点去思考。文学起源于一个人必须说出他的生存、感受、困惑。在传统审美维度之外,我们应当承认真实性维度、独特性维度和共情力维度的合法性。这不是降低标准,而是让标准更贴近文学的实际发生方式。这个认知转变是全书的理论基石。

第二是对“新大众文艺”与“大众文艺”关系的厘清。我翻阅了大量文献,尤其是关于延安文艺、抗日根据地文艺、解放区文艺的。这一时期的大众文艺的特点是知识分子走向人民,创作者大多数是精英知识分子,他们的书写对象是广大人民群众。而新大众文艺是“人民自己走向文学”,是创作主体的迁移。这个辨析一旦清晰,全书的理论坐标就建立起来了。

第三是对算法与新大众文艺的关系的辨

析。在对会说“人话”的AI与算法控制下的大众以及赛博空间的新大众文艺的探讨中,对AI“准主体”这个概念有一个艰难打磨的历程。我试过工具、中介、环境等概念,但都觉得不够准确。直到有一次重读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读到“非人行动者”这个概念时,决定用“准主体”这个概念。这样可以避免陷入两种极端,让我们可以客观地描述人机合作的新现实。

让文学理论重新与那些真实而具体的生命经验连接

记 者:您多年来始终扎根文艺现场,既深

AI写作、大文学观等前沿问题。

记 者:从既往的研究到此次获奖的作品,您的写作始终保持着“理论不悬空、现场不浅表”的特质,既有对文艺现场的敏锐捕捉,也有对文学精神内核的坚守与追问。能否请您谈谈您一以贯之的文学理论评论观念与学术理想?在您看来,一篇优秀的文学理论评论文章应当具备怎样的品格?

卓 今:湖南省社科院的职能,有一大块是要做调研报告和智库报告。文学研究所是以基础研究为主,湖南文学和湖湘文化是我们的重要研究对象,因此我们也经常在外面跑,去各州市了解文学创作情况、文化发展情况等,始终与现

性概念。

信息时代的文学研究有太多新的增长点

记 者:请您谈一谈您对大文学观的认识。
卓 今:我在书中有一章专门探讨大文学观,两万多字。大文学观要纳入新大众文艺这个大主题下才好谈。传统“纯文学”观念已难以涵盖当代多元文学实践,亟须重建更具包容性的大文学观。文史哲不分家是大文学观。在张之洞对书院进行改革并采用新的学科分类之前,“四部学”也是大文学观。近代西方“纯文学”观念影响后,文学概念在收窄,互联网时代又再度扩容。大文学观还要与AI写作一起谈。大文学观强调文学的媒介性、参与性和多模态性。在这样的时代,文学的核心功能是连接。它是动态生成的“众在”生态系统。我在书中把“大文学”划分为不同层次,并确立了文学性底线、连接性强度等边界原则。大文学观是要直面AI写作的,我在书中采用“分层共融”的分析框架。其中,人的创作在核心层,AI创作在相关层,它缺乏“人学”内核。AI既是“空心文本”的制造者,也是阐释的中介装置,倒逼人类反思文学的本质。最终,大文学观倡导多元评价体系并存,在技术时代守护文学的人文根基。

记 者:您接下来有哪些新的研究与写作规划?在日新月异的文艺现场面前,您认为今天的文学理论评论有哪些新的增长点、需要克服哪些困难,以持续推动文学精神的生长与重构?

卓 今:我在写这本书时又想到了许多新问题,这些问题要弄清楚很难。比如对“数字时代的文学感知”的深入探讨。很多读者抱怨现在读经典文学读不下去,这其实触及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当我们的注意力结构、时间感知、情感体验方式都在被数字媒介重塑时,文学作为一种需要持续沉浸的审美活动,其根基正在发生动摇。我想探讨时间感的变化如何影响文学创作和接受的底层逻辑。某种程度上,这是对《劳者歌其事》的一种延伸。又比如“算法时代的叙事伦理”这个问题。当下AI已经深度介入文学创作,不仅网络文学大量使用AI辅助,一些纯文学作家也在尝试用AI进行创意激发。我想追问的是:当“人机合谋”成为常态,叙事主体的感受及其真实性和真诚性如何界定?我们需要追踪AI在不同文体中的渗透程度和伦理后果。信息时代的文学研究有太多新的增长点,丰富而复杂的文艺现实还有待进一步理论化、体系化。再如媒介物质性研究。今天的文学作品是“文字+图像+声音+交互的复合体”。传统的研究方法已经失效。创作主体、文本形式、接受主体,每一个环节从形式到内容都需要重新思考。

我们最大的困难其实是理论滞后。我们写一本书、发一篇论文的周期是几年,而文艺现场的变化是以周甚至以天计算的。我写《劳者歌其事》时讨论的平台和现象,有些已经迭代了好几轮。比如我去年调研的AIGC占新大众文艺的比例是5%,今年这个数据已经暴涨了好多倍。这种理论永远在追赶现实的困境,短期内无解,但研究者必须保持一种自觉,我们写下的每一个判断,都只是此时此刻的描述,而不是永恒的真理。

劳者歌其事,作为一个文学理论评论的劳动者,我所歌的“事”就是持续地走进现场、持续地倾听那些正在发生的声音,持续地用理论去回应那些具体而微的问题,持续地预判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



卓今部分作品

耕基础理论,也持续追踪前沿文艺形态的发展。能否请您回望一下自己的学术与理论评论之路?是怎样的机缘与人生积累,让您走上了文学理论评论的道路?

卓 今:我2005年刚到湖南省社科院的时候,就接了一个重要任务。当时我们研究所负责撰写《当代湖南作家评传丛书》,第一辑包括四位作家——彭燕郊、谭谈、孙健忠、残雪。我负责写《残雪评传》,这对我后来做理论和评论产生很大的影响。残雪的作品以深刻的隐喻和暗示著称,要全面认识残雪的文学创作需要一定的文学天赋和理论功底。我初生牛犊不怕虎,贸然接下了这个艰巨的任务。为了写好这个评传,我还阅读了大量的中外现代派作品。大家都知道,现代派作品充满了异化、荒诞和孤独感,其中隐藏着非理性主义哲学、精神分析学、存在主义哲学等。我多次采访残雪的哥哥、哲学家邓晓芒先生,从他那里了解残雪的家世和生平。从这时起,我钻研康德、黑格尔哲学,重点研读《判断力批判》和《精神现象学》,起初读得很吃力,书上做了密密麻麻的标注。这为我后来的研究打下了理论基础。我博士师从张江老师,主修阐释学,对中国阐释学从先秦到当代进行了理论资源整合及谱系研究,又从西方哲学家施莱尔马赫、狄尔泰、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利科、哈贝马斯等人的阐释学理论中受到启发。我供职地方社科院,需要做接地气研究,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文学批评现场和地方文化研究,这也是我为什么较早介入新大众文艺研究的原因。互联网条件下的新大众文艺,算法是底层逻辑,因此,“算法诗学篇”占了我这本书三分之一的篇幅,有8万多字探讨算法、赛博空间、

场保持一种持续对话的关系。我在调研时,常常会被他们的文学热情所感染。新大众文艺蓬勃兴起,作为文学研究者,我有职责为那些在数字时代发出声音的普通人提供理论上的呼应和正名,同时也是让文学理论重新与人、与生活、与那些真实而具体的生命经验连接起来。

其实我的窍门就是做学问要保持诚实,用笨功夫,对看到的、听到的事物充分调研,不急于评判。最重要的是保持问题意识,任何事物先找出它的第一性原理,探究其背后的原因,以问题的方式切入。面对研究对象,老老实实把文献做扎实,把问题弄清楚。同时还需要充分考虑研究对象的历史语境和现实条件。批评家的理解最容易受“前见”的制约,所以,就要克服不合理的“前见”,巧妙运用伽达默尔所说的“效果历史”和“视域融合”,毕竟脱离历史语境的绝对客观认知是不存在的。这些都是原则性的东西,在进行新大众文艺研究时尤其重要。

记 者:能否请您聊聊该书从成稿、修改到发表的相关细节?

卓 今:“新大众文艺”这个概念是2024年《延河》杂志首倡的。一年多时间完成一本书是不可能的。我这本书的“算法诗学篇”,一部分是2022年至2025年间发表过的论文。“走进大众篇”中对人民文艺的历史性回顾也是积累多年的结果,一直找不到出口,后来把它们纳入新大众文艺中进行思考,就特别顺利。其中的很多议题,与我过去的阐释学研究,有着密切联系。只有“劳动者星丛篇”是2024年至2025年写成的。把所有的问题重新思考以后,形成了三大板块,从历史比较到互联网现实,再到新大众文艺个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提出了一些原创

擦亮中华文明重要名片

(上接第1版)

北京中轴线,“老城不能再拆了”振聋发聩。北京市以世界遗产申报保护工作为抓手,推进重点文物腾退和周边环境整治,推动老城整体保护与复兴。胡同留住了,四合院修缮了,老居民留下了。

泉州修缮古城风貌建筑空间,提升遗产地居民的人居环境;景德镇吸纳社会力量参与支持瓷业遗产保护,引导手工制瓷及相关创意产业入驻;荔波喀斯特、梵净山带动周边村寨发展,村民通过销售手工艺品等实现了家门口就业……

“中国很清楚文化的力量,也清楚保护文化遗产的必要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说,“在对《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理解和履行上,中国是不断创新、丰富公约内涵的引领者之一。”

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世界遗产申报保护工作连续取得多项重要、突破性进展,“高光时刻”频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共有18个项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遗产总数不断刷新、居世界前列。

“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

2021年7月16日晚,福建福州。这座拥有22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汇聚世界遗产爱好者的目光。

在当日开幕的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来贺信,深入阐述当代中国的“世界遗产观”——

“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赓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中国践行新发展理念,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精神,认真履行《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不断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

大国之诺重千钧。申遗成功不是终点,后续

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进一步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的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要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传承、利用工作,使其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

循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不断探索中国特色的世界遗产保护理念与实践,推动申遗成果全民共享。

走进敦煌石窟监测中心,大屏幕上,莫高窟等6座石窟的旅游开放状况、文物保护现状、洞窟本体及微环境监测等内容尽收眼底。

“努力把研究院建设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运用先进技术加强文物保护和研究”。2019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的殷切期望,一直鼓舞着这里的每一个人。

2020年,敦煌研究院建成国内首个文物保护领域多场耦合实验室;2023年,“数字藏经洞”上线,利用人工智能打造贯通古今的数字图书

馆;截至目前,“数字敦煌”团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敦煌石窟数字档案,项目总数数据量超600TB。

从莫高窟以科技“跑赢时间”,到曲阜孔庙、孔林、孔府创新传承“岁修”模式;从以申遗带动北京、厦门、泉州、景德镇老城整体保护,到以世界遗产标准管控拉萨、承德、曲阜、平遥、杭州等老城整体格局……我国立足自身实际,不断推进世界遗产理念“本土化”。

从故宫、殷墟、大运河沿线、北京中轴线各遗产点频频推出精品展览、爆款文创,到良渚古城遗址、澳门历史城区、苏州古典园林、元上都遗址等价值展示体系不断完善;从积极推动社区参与世界自然遗产保护管理,到每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深入城市与乡村……世界遗产越来越“活”在当下,越来越深入人心。

以世界遗产为桥,让世界更懂中国。

2014年6月,随着我国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申遗成功,“共同推动丝绸之路沿

线国家联合申遗成功”的愿景化作现实,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在文化领域的重要成果。

长期以来,中国始终以负责任态度参与世界遗产领域全球治理:成功举办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石窟寺保护国际论坛;与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等国际组织合作推进保护理念、数字技术、遗产监测研究,联合开展管理咨询、能力建设项目;大运河、长城相继获推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保护管理示范案例;探索形成世界自然遗产跨区域协同保护的有效治理模式,为落实世界遗产委员会跨区域协调保护倡议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申遗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利用,要总结成功经验,借鉴国际理念,健全长效机制,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2017年盛夏,鼓浪屿申遗成功后不久,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

放眼锦绣山河,深情的嘱托正化作世界遗产申报保护工作的壮阔实践,中华文明标识越擦越亮,世界文明百花园美不胜收。

(新华社北京7月25日电)